

飛來橫禍，生死一線

新疆三夢志異

● 丁慰慈（大學教授、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

盛世才恐怖治新疆

新疆佔中國領土六分之一，但由於交通阻塞與中央政府常呈脫輜狀態。民國二十一年到三十一年的十年間，新疆在蘇聯操控下成割據狀態，新疆省督辦盛世才與克里姆林宮訂錫礦條約實際上就是控制全新疆的地下資源。至於業已具體化的，有駐在哈密的紅八團，獨山子的石油礦，以及頭屯河的農具製造廠（即飛機裝配廠），都完全是蘇聯的特區，沒有一個中國人能進入一瞻究竟。新疆與蘇聯邊境，門戶洞開。但與我甘肅省接壤的唯一邊卡猩猩峽，反而警衛森嚴，中國人無論由新省到內地或由甘肅經猩猩峽到新疆，均須事先請求督辦盛世才本人的批准。

彼時全新疆沒有一個工廠，甚至沒有一個火柴製造廠，所有的工業品都是由蘇聯運來，所有的原料品，諸如皮毛、礦砂、米麥，都運到蘇聯去。蘇聯在迪化設商務代表辦事處

，專司其事。而它的對手方便是新疆省政府所屬的「裕新土產公司」。當時新疆與蘇聯的關係，可以一件小事來說明，就是二月二十三日紅軍節，這個節日在蘇聯本國並不放假，但在新疆，卻由省府通令機關學校休息一日。

當時的新疆，的確是做到「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的程度，省當局以特務的手段，使全新疆人民十年中喘息於恐怖戰慄之下，因而保障了盛世才政權的安寧，也就是美其名的，盛世才所津津樂道的「永遠保障新疆為中國領土」。新疆的特務本來最初全部人事及組織系統都是由莫斯科派人來建立的，但其後逐漸卻控制到盛世才自己的手裡，因而使新疆當時未致完全落入克里姆林宮的掌握裡，這一點，盛世才的確有其超越常人的地方，而迫使莫斯科召回所派出的人員，盛氏是冠以「託派」之名，即所謂以其人之道

，還治其人之身。

新省同胞如何生活於戰慄恐怖之下呢？

那就是不斷的製造所謂「陰謀暴動案」，藉口陰謀暴動，按事先既定的名單，編造驚心動魄的案情，先從最有地位的一、二人開始，然後以逼供的方式，株連其他的人，而使盛世才預定的名單上的人網羅無遺。這種「陰謀暴動案」的「頻率」大約兩年一次，每次株連的人數，大約至少數千人，多則上萬，而範圍及於全省，被逮捕的固然多是社會的精英，但目不識丁的勞力者亦未嘗沒有在其中，四百萬新省同胞人人自危，今天不知明日事，有的公務員甚至經常準備進監獄的被蓋捲，以免臨時手足無措。以教育廳來說，十年之內有八個廳長被送進監獄，前任省主席劉文龍也在禁閉之列，其他的人，就可想而知。「誅鋤異己」這一名詞在新省當時是不適用的，因為許多因製造案情而被捕的方面負責人都是盛氏的摯友，而以東北同鄉爲多，彼時社會上的人際關係，祇有「道路以目」這句話，才能形容當時新省人民在生活中的恐怖狀態，在這種氣氛下，當時尚能

懷有安全感，而具有「免於恐怖之自由」的祇有四姓，那就是盛、邱、汪、李，邱是盛的妻兒，汪是連襟，而李則是盛前後任的特務主持人，加起來大約不會超過一打之數。

德軍攻蘇盛傾中央

一九四一年六月，德軍攻蘇，史大林倉卒應戰。納粹的前線軍隊包圍列寧格勒，直至莫斯科邊緣，駐蘇的外交團也遷移到古比雪夫，蘇聯在新省的控制權也因而減弱。

抗戰初期，蘇聯為減輕其東方的日本的威脅，對我國作大量軍事援助，為訓練航炸及飛行人員，我國在伊寧設立航空教導隊，由莫斯科供給器材，派人訓練，這便是因抗戰原因在新省中央勢力所能直接調動指揮的唯一機構，但每一個人入境，也必須事前得到盛督辦的親自批准，而在哈密機場則由紅八團暗中加以監視。

蘇聯在新疆控制力減弱，我國抗戰方殷，且取得長沙三次大捷。盛世才激於民族大義，向中央投誠，供述他到莫斯科面見史大林及加入國際共黨的經過，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十六日，蔣夫人偕同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中央宣傳部長梁寒操及外交部駐新疆特派員吳澤湘抵達迪化，中央任命盛世才為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設中國國民黨新疆省黨部，軍官學校第九分校，外交部設駐新疆特派員公署，所有涉外事宜完全歸公署管轄，中央並推薦羅家倫率領的西北考察團團員林

繼庸為新疆省政府建設廳長。

外交特派員吳澤湘履任後，首先辦理國境出入簽證制度，使蘇聯公民出入我國境時受到國際法的約束，接著積極進行交涉收回紅八團的營地，獨山子石油礦以及農具製造廠（即飛機裝配廠）。

噩夢醒來銀鑑入獄

從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的春天到一九四四年的春天，蘇聯旅新公民遵守國際法上的出入規則，上述所建立的營房、工廠及油礦等，亦由新疆省政府備價購回。最可稱幸的，就是週期性的全省性的大規模逮捕無辜人民情事，即所謂「陰謀暴動案」也極少有所聞。

不幸一九四三年冬，羅斯福、邱吉爾、史大林德黑蘭會議，商定同盟國共同作戰方略，加之以扭轉時局的史大林格勒大捷，蘇聯軍勢大振，盛世才見蘇聯政府危期已過，經深思熟慮，迺決心重返回他前所採取的政策——親蘇路線。

一九四四年四月，盛世才再度恢復他的恐怖政策，將省政府秘書長，教育廳長、伊犁區、哈密區的行政督察專員及新疆日報社長多人逮捕。過去，在盛世才恐怖案件中，從未逮捕過中央政府派駐新省的人員，倘有盛對其不滿意的，均由省府請中央調回，不料這一次逮捕，竟然是盛世才大規模羈押中央所派人員的一個序幕。

當時筆者正供職於外交部駐新疆特派員

公署，同事五人，飯後買了一個西瓜來吃，剖開一看，竟是半生的白瓢，這在盛產名瓜的新疆，幾年來倒是第一次，大家掃興萬分，心情很壞，本來已約定的想去陪醫院裡的幾位小姐（中、俄混血的「二轉子」）跳舞，也就臨時取消，大家無精打采地在附近作了一次散步，對那傍晚的夕陽，大家心中似乎都有莫可名狀的惆悵。

那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十一日，上床後我經歷了平生所未曾有的奇異感覺，既非失眠，也未入寐，亦不是夢境，更不像酒醉的情況，祇覺得神魂飄盪，離開我的軀體，子夜一時，陡覺得有兩個警察站在我的床前，並聽到他低聲呼喚道：「督辦請丁科長開會」，因為我不是新疆人，在此以前，由於住在「道路以目」的社會，對恐怖事件瞭然無知，兩個警察，其中之一便是公署門口站崗的，因此我當時祇覺得事情之嚴重，並不感到事情之如何恐怖。

原來所謂請開會，都是當時逮捕較具有身分地位人物時的一種托詞：事實上我是直接被汽車送到新疆省規模最大的第二監獄。

同房中有維吾爾、韃靼、烏茲別克、哈薩克和塔蘭其諸族，連我這個漢族共六人，其中最高的教育程度是一位中學教員，其他的是牧人、商人、泥水工人，祇有中學教員能通少許漢語和俄語，其他的人祇能講本族的話或少許俄語，每一個人都不知道他們被

捕的原因，他們聽我在中央機關供職，也被抓來，都伸出舌頭。

我們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我渴望建督辦真的會請我去訊問，痴想一切「誤會」經解釋後即可冰釋，我蒙在鼓裡，以為盛督辦係被下面的人所蒙蔽。

維族石子算命凶兆

同「號子」的囚犯都極同情我，我用漢語與俄語和他們交換著談，唯一的消遣，是他們獨特的卜卦方式，以五十多顆石子一再分堆，占卜是否能再見光明。此外祇有在高牆上的小窗中，可以見鴻雁的飛過，在這種環境下，最令我奇怪的，就是遙遠處還清晰地傳來督辦公署上紀念週奏國歌時，嘹亮而莊嚴的軍樂聲。

在焦灼與惶惑中，也有難友東拉西扯聊

天，無可奈何的打發了九天日子，就是那天晚上，我夢到獨自一個人坐在潔白的檯布上用西餐，但席上刀叉都是斷的，夢中我也沒有進食，次日我將夢告訴那兒比較與我談話卜的人，他聽了我說後，當即回答我道：「這是大凶之兆」，我聽了以後，似信非信，「凶」到何等程度，我腦筋裡也無法加以想像。

當天下午，我看守者用一個黑布罩籠住，用驟車將我送到被審訊的地方，事後我才知道，這是天主堂，被盛世才沒收後用來

作刑訊之處，被送到此地的囚徒，不死也得脫一層皮，全新疆人聽到天主堂這一詞，都會毛骨悚然，不寒而慄，盛世才將宗教的聖地改為慘絕人寰的煉獄。

吊坐站鞭打夾灌刑

我在獄中除獄卒與獄吏外不知道是否尚有他人，在一天兩夜的時間，我慘遭吊（吊十字架）、坐（坐老虎凳）、站（站石炭尖）、鞭（鞭身）、打（打手心）、夾（夾子彈殼）與灌（灌水）七種酷刑。其中「打」使我左手心皮肉盡脫，「夾」使我手指痛澈心肺，精神與肉體都受重大損傷，至今想起來猶有餘悸，「灌」是用水灌鼻，感謝行刑人並未十分認真執行，而被我掙脫，否則我早已成殘廢之身，今天難以提筆寫這篇稿了。

他們對我用苦刑的目的，是要摧殘我的精神和肉體，使我胡說一通，而要這些胡言亂語，在人物、地點、時間和情節上，符合於盛世才事前所編撰的「案情」。在用刑時，獄吏不斷與盛世才在電話上報告所謂的口供，再由盛本人指示是否繼續用刑，我在受刑時，不禁回憶到兒時所熟讀的「記左忠毅公逸事」，深愧不如先賢的風烈於萬一。當時任新疆監察使的羅家倫先生，在中央控制局面，事情平定後細聽我們的述說，深致感慨說，他今天才知道何以十月革命時的開國元勳們在史大林時代都會自供為德國的好細

和日本間諜。

經過一天兩夜之後，我被停止用刑，還被蒙上黑布口袋，坐上驟車，離開天主堂送回第二監獄，難友們見我形銷骨立，前後判若兩人，都流淚來照料我，把我扶到木板上去休養，大家都安慰我說：「你『過堂』還未死，真是太幸運了。當時我們見你被提出去，就十分害怕，但是不敢說出來，都認為從此不會再見到你了。」

回到第二監獄的第七天，我做了一個夢，夢到在一條窄街中，我在雨中行走，不幾步後我就走到一個騎樓下去躲避，接著雨也停了。

我將此夢說給他們聽，中學教員說，身在驟車裡，我經過了這場大難，早已將生死置於度外。但這一次卻不是到天主堂，而是到督辦公署的辦公室，長方形桌上，上首坐

盛世才，右爲朱紹良，左爲徐恩曾，還有李秘書，我則坐在盛的對面。盛世才張著他那雙殺氣凌人的大眼，要我把進行陰謀暴動的內容再招一遍。見中央兩大員在座，我遂委婉曲折地表示我是清白之身，盛世才勃然大怒，立刻命獄卒將我帶走，再蒙上布罩，坐上驃車，返回第二監獄，我事後方知，倘不是盛世才離開新疆太匆匆，我早已成他刀下鬼了。

九月十日，我做了一個長夢，夢境離奇而複雜，原來我進中學時，學校演戲都是到木匠店租木板來搭建劇臺，這種劇台的特點是祇有前面平整，而後面是參差不齊。

我夢中發覺我孤立於一座臨時搭建的劇臺上，但卻是劇台的前端木板參差不齊，我剛在凝神的時候，一隻龐然大物的象突然向我走過來，並將鼻捲往上伸縮著向我示威。我在夢中嚇怕已極，趕緊背著身子往後退，我發覺在參差不齊的劇臺上，我正立在一塊伸出最長的一塊木板的末端，如再退便將跌下台去，而大象舞動它的長鼻，正在逐漸逼我而來，恰巧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一個穿大禮服戴高帽的人，手持一枝短小的指揮棒，急速地向大象搖動，大象立即馴服下來，乖乖地跟著那位手持指揮棒的人退到後台去。

接著在夢中又彷彿表演開始。我和若干觀眾圍住看，但都在站著，沒有坐席，表演的節目，我當時模糊不清，可是隨同我看的

觀眾，其印象至今猶在我的腦際，觀眾之中有歐洲人、有黑人，有的白布包頭，有的著長袍，也就在隨著這群人圍著看表演時，我就醒了。

這一個夢最使我難忘，因爲既非所謂的「日有所思」，而日後所經歷的形形色色的大小場面，竟清晰地彷彿當時夢中的光景。其後於一九四七年我在莫斯科看大馬戲團的演出，穿大禮服手持指揮棒的馴象師，宛如如夢中所見，爾後我服務外交界二十餘年，足跡遍歐、美、非、亞大陸，參加無數次的外交宴會，諸如黑人、包頭的印度人、著長袍的阿拉伯人，看去又都不覺陌生，與當時

夢中的情景，一般無二，而這些事物，大象也、馴象師也，包頭的印度人及黑人也，都是我當時在做夢前所從未會見過的，因此就不能以「日有所思」來解釋我這離奇而曲折的長夢了。

九月十一日，我做夢的第二天，也就是我入獄滿一個月，當天早晨，獄卒傳來喜訊。高興得使全獄的難友們不能相信，全新疆水深火熱的同胞不能相信，那就是盛世才已隨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和徐恩曾飛重慶就任農林部長的職務。

當天下午，中央派駐新疆的人員被集中在一處，到這時彼此才知道都進了監獄。大家都相互擁抱，慶祝重生。

我這三個夢境，都是在第二天應兆。但奇怪的還不止此，遠在我進初中時，我那精於風鑑的伯父爲我推八字，就預言我二十九歲那一年有大難！但能逃出來。我雖不相信與家中通訊時，我唯一的姐姐於無可奈何之中，祇有求神問卦之一途，我的姐姐將我的八字告訴一個瞎子，他推算的結果向我的姐姐說我當年犯「血光星」一直到我出獄後再與家人通訊時，姐姐才把這件事告訴我。

阿拉伯少女看手相

另一件事與此聯繫令我終生難忘，此事發生的二十年後。一九六四年我在駐約旦大使館服務，於一個酒會中見到前駐約旦伊拉克大使的女兒，她大約二十四歲年華，主人介紹她精於手相，在客人中，主人首先介紹我請她觀察，她看我的手掌不到一分鐘，她竟然確切地說：「你曾經進過監獄」。——這是二十年前的往事，連我許多朋友都未必知道，而一個初次謀面的陌生小姐竟然肯定地對一位陌生的外交官率直道出，實在不能不令人驚異，我祇好把新省未成熟的政變這段往事告訴她，並問她如此年輕，何以能如此「神算」。她說，幼時曾看過一本阿拉伯文的古書，有所心得，不免有時試驗一番，但她卻在我驚異恭維之下，一再地向我表示說：「我實在不相信這些」。